

再论女真文化与汉文化的冲突

沙 勇

(甘肃民族师范学院 历史文化系,甘肃 合作 747000)

摘 要:为探究女真文化与汉文化的关系和女真汉化与金亡的关系,结合大量史料和前人对女真汉化与金亡关系的见解,对金世宗时期女真文化与汉文化冲突出现的背景、原因和表现等进行剖析。分析认为:面对女真民族传统文化的日渐丧失,金世宗在维护女真文化本位思想的基础上,积极寻求2种文化的契合点,通过兴办女真字学、创立女真进士科、翻译儒家经典为女真字文本等措施,力图改变这种现状,然而最终未能阻止女真人的汉化趋势,女真文化复兴运动宣告失败,但金世宗为保存民族文化、维护民族传统所做的努力是值得肯定的。

关键词:金世宗;女真文化;汉化;述论

中图分类号:K246.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1-6248(2012)03-0101-06

自晚清以来,女真文化与汉文化的关系、女真汉化与金亡的关系成为学界研究的热点,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由于所处时代背景和社会背景以及探究视角的不同,学者的研究结论也不尽相同。综合前人观点来看,金世宗在汉化和维护女真文化的态度上,本身就存在着矛盾心理:一方面,他要想方设法寻求2种文化的契合点,将2种文化很好地结合起来;另一方面,他要保持女真民族的传统文化,特别是“质朴”、“尚武”的传统,为自己的统治更好地服务。但事与愿违,女真人融入汉族,汉化的潮流势不可挡,所以在他统治时期,为调和2种文化的关系、恢复女真文化而做出的努力,最终以失败而告终。

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笔者主要从以下3个方面进行了论述:从不同的视角出发,探讨金世宗时期女真文化与汉文化冲突出现的背景;在女真文化本位思想基础上,金世宗寻求2种文化的契合点以及为挽救女真传统文化所做的努力;后人对汉化与金亡关系的不同看法。

一、女真文化与汉文化冲突成因

分析历史事件的起因,不仅要考虑主观和客观因素,还要挖掘历史事实背后所隐藏的因素,即当事人的个人经历、社会、政治环境以及民族文化心理。

(一) 成长经历对金世宗个人性格的影响

金世宗是一位地道的女真皇帝,深受女真传统文化的影响。据记载,世宗“善骑射,国人推为第一,每出猎,耆老皆随而观之”^[1]。从这段史料可以推断出,世宗自幼就接受了女真人的传统教育,其中骑马、射箭是必不可少的技能,史料也反映出他有着强烈的女真文化意识。与此同时,汉文化对世宗的影响也较深。世宗登基之初,即说过“朕尝慕古之帝王,虚心受谏,卿等有言即言,毋缄默以自便”^[1]。他也曾对大臣们提到“朕虽年老,闻善不厌,孔子云‘见善如不及,见不善如探汤’大哉言乎”^[1]。这里

所说“古之帝王”，自然是指汉民族的贤明君主，可见世宗对汉文化非常熟悉，这与其所受的教育有莫大的关系，世宗是一位受儒家思想影响极深的君主，并且将自己所学用于治国。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世宗个人深受女真、汉2种文化的影响，但更偏重于女真文化。大臣唐括安礼曾对世宗说：“猛安与汉户，今皆一家，彼耕此种，皆是国人。”^[1]世宗随即说：“朕谓卿有知识，每事专效汉人……，卿习汉字读诗书，故置此以讲本朝之法。前日宰臣皆女直拜，卿独汉人拜，是邪非邪。所谓一家者皆一类也。女真，汉人其实则二。朕即位东京，契丹、汉人皆不往，惟女真人偕来，此可谓一类乎？”^[1]且世宗登基大位之前，并非养尊处优，曾历任会宁牧、中京留守、燕京留守、济南尹、西京留守、东京留守等职，对女真民族的社会生活是非常熟悉的。世宗曾对臣子说过“上京风物朕自乐之，每奏还都，辄用感怆。祖宗旧邦，不忍舍去。万岁之后，当置朕于太祖之侧，卿等无忘朕言”^[1]。从这些君臣谈话可以看出，世宗对女真民族的传统不仅从未抛弃过，而且还很执着。

（二）出于对本民族危机的反思和担忧

金建国初期，大量任用汉人，采用中央集权的政治体制，到海陵王迁都燕京，女真人汉化急剧加速。特别是猛安谋克人的大批南迁，女真人大批进入中原，女真文化丧失了其赖以生存的环境。人文因素的缺失，加速了民族文化的衰落，女真民族的文化传统危机重重。

1. 民族自立信念已经丧失

女真人本居于白山黑水之间，以渔猎为生计，生活质朴，不事奢华。南迁汉地，意味着要适应复杂的农耕社会生活，这是他们难以接受的，因而失去了自立的生存能力。大定二十一年（1181），世宗对朝廷臣僚所说的一段话清楚地表明了当时普通女真人的生活状况：“山东、大名等路猛安谋克户之民，往往骄纵，不亲稼穡，不令家人农作，尽令汉人佃种，取租而已。富家尽服纨绮，酒食游宴，贫者争慕效之，欲望家给人足，难矣。近已禁卖奴婢，约其吉凶之礼，更当委官阅实户数，计口授地，必令自耕，力不赡者方许佃于人。仍禁其农时饮酒。”^[1]史籍中此类记载屡见不鲜。当时中原各地猛安谋克人，或“以田租人，而预借三二年租课”，或“种而不耘，听其荒芜”^[1]，这样的经营状况导致女真户日益贫困，“颇有贫者，汉户租佃田土，所得无几，费用不给，不习骑射，不任军旅”^[1]，甚至以卖奴婢和土地来维持其寄

生生活，猛安谋克户逐渐成为一个特殊群体，依靠国家供养才能生存。国家不断为猛安谋克户括地，其逐渐堕落为农耕文化的消费者，锦衣玉食，贪图享受，失去自立的生存能力。

2. 背离了女真民族“尚武”的文化传统

据记载：“金兴，用兵如神，战胜攻取，无敌当世，曾未十年，遂定大业。原其成功之速，俗本鸷劲，人多沉雄，兄弟子姓，才皆良将，部落保伍，技皆锐兵。”^[1]作为一个新兴的马上民族，女真人具有一种天然传统的“尚武”精神，这是他们当时无敌于天下的主要原因。受封建文化和儒家思想文化的濡染，世宗大力提倡文治，加之社会稳定，财富剧增，女真统治集团和社会上层日益奢靡，“尚武”传统精神衰退，自然尽失其昔日的勇锐。如陈亮所指“舍戎狄鞍马之长，而从事中州浮靡之习”^[2]。熙宗俨然汉家少年子，本以武功显赫的功臣，在他眼中被视为无知的“夷狄”。据南宋归正人说，海陵末年，金人在其最擅长的骑射方面已不如宋人，“虏人所射弓不过五斗，本朝战士所射弓多是一石或二石者”^[3]。至世宗时，统治者开始清醒地意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世宗曾对兵部郎中高通说：“女直旧风，凡酒食会聚，以骑射为乐。今则奕碁双陆，宜悉禁止，令习骑射。”^[1]大定八年（1168），朝廷从猛安谋克中遴选侍卫亲军，而“其中多不能弓矢”^[1]。可见，女真人的日趋文弱化已经是一个相当普遍的现象。世宗对此非常担忧，在一次谈话中说：“朕闻宋军自来教习不辍，今我军专务游惰，卿等勿谓天下既安而无豫防之心，一旦有警，军不可用，顾不败事耶？其令以时训练。”^[1]金朝诗人史旭以诗反映了这种现状：“郎君坐马臂雕弧，手捻一双金仆姑。毕竟太平何处用，只堪粧点早行图。”^[4]世宗极力提倡女真旧有的风俗传统，希冀恢复女真民族勇猛善战、淳朴节俭的本性，保持女真人强悍的战斗力的战斗力，从而加强军事实力。于是就有在上京的劝诫之语：“太平岁久，国无征徭，汝等皆奢纵，往往贫乏，朕甚怜之，当务简约，无忘祖先艰难。”^[1]

3. 民族文化情感逐渐疏离

语言、服饰、姓氏是体现民族文化的主要标志，对其认同与否，可反映出民族情感、民族心理的变化。由于对民族文化的淡化，女真人的后代不讲甚至不会讲女真语；不习惯穿本民族的服装，以穿汉服为时尚、荣耀，且“渐有文饰”^[5]。至于与汉人杂居通婚、改易汉姓等现象则更普遍，对此现象，《金国语解》里罗列了数十种^[1]，在此不再赘述。世宗时，连太子都不知女真风俗，甚至宗室诸王已不通晓女

真文字。对此,世宗甚为担忧,他认为女真族的汉化将危及女真王朝的存在。

(三) 政治形势使然

因忌惮上京女真宗室的守旧势力,海陵王迁都燕京及南征的失败,给金世宗留下了一个内忧外患、岌岌可危的政局,金朝与南宋长期对峙,因而不能不保持其作为统治民族的自身习俗,以使“尚武”勇悍的民族传统不致丧失。随着内部权力发生变动,女真实力大为削弱。针对当时重文轻武的倾向,兀术之子完颜伟一针见血地指出当时政治形势的危机:“自近年来多用辽、宋亡国遗臣,以富贵文字坏我土俗……今皇帝既一,向不说著兵,使说文字人朝夕在侧,遗宋所传之志,于是有志报复。今滕骨不受调,夏人亦复侵边,陛下舍战斗之士谓其不足与语,不知三边有急,把作诗人去当得否?”^[5]翰林侍读学士张酢等亦指出:“军阵不修三十年,阙额不补者过半,其见存者皆疲老之余,不堪战阵。大定初已万万不如天会时,今沉溺宴安,消磨殆尽矣。”^[5]大定年间,任宰执的女真人粘割斡特剌也持有类似的观点,他曾对世宗说:“以西夏小邦,崇尚旧俗,犹能保国数百年。”^[1]世宗也曾向大臣移刺子敬流露过这种想法:“亡辽不忘旧俗,朕以为是。海陵习学汉人风俗,是忘本也。若依国家旧风,四境可以无虞,此长久之计也。”^[1]这是当时部分女真上层人物的一种共识,他们认为应该仿效辽朝和西夏的做法,努力保持女真人的文化传统和民族本色。在世宗看来,要想使金统治国运长久,维持女真人的民族传统是至关重要的。

二、金世宗为恢复女真文化所做的努力

自熙宗、海陵以来,女真汉化加速,到金中叶已发展成为一种社会激流,这使金统治者感到非常忧虑。世宗大定年间,他曾对参知政事孟浩说:“女直本尚纯朴,今之风俗,日薄一日,朕甚悯焉。”^[1]孟浩对此也颇有同感:“臣四十年前在会宁,当时风俗与今日不同,诚如圣训。”^[1]正是基于此种考虑,海陵后的混乱局势一稳定,世宗就开始了对女真传统文化的恢复,为此努力寻找汉文化与女真文化的契合点,试图把儒家文化融入女真传统文化,即“主要是撷取儒家‘仁义道德’的观念体系,力图使之成为女真民族的思想基础”^[6]。但世宗的努力深陷于汉文化与女真文化矛盾之中,既想遏止女真人的汉化趋势,又想利用汉文化来提高女真文化。对于世宗的这些

努力,日本学人三上次男称之为女真文化的复兴运动^[7]。

(1)兴办女真字学,创立女真进士科以及用女真大小字翻译儒家经典。女真字学,虽然始创于太宗天会年间,但毕竟数量有限,可考者仅有上京、西京和北京3处,而且自熙宗以后,女真字学已无人知晓。世宗大定初,在全国各地大兴女真字学,“择猛安谋克内良家子弟为学生,诸路至三千人”^[1],后又定制“每谋克取二人”^[1]。大定十三年(1173),始创女真国子学,后又创建女真太学,各路广设女真府州学,“其学大振”^[1]。据记载,诸路女真府州学共计22所,但实际上可能不止此数^[1]。大定九年(1169)出使金朝的宋人楼钥,途经中都路保州时见到的保州女真字学,就不在上述22所府州学校之内^[8]。世宗兴办女真字学的主要目的,是为了推广和普及女真大小字,藉以保存女真族的文化传统。

为了加强女真文化的影响,金政府采取了严厉的措施,一再提出:世袭猛安、谋克必须学习女真字,“凡承袭人不识女直字者,勒令习学”^[1]。后来,又进一步规定“猛安、谋克皆先读女直字经史,然后承袭”^[1]。大定九年(1169),世宗采纳枢密使完颜思敬的建议,规定“亲王府官属以文资官拟注,教以女直语言文字”^[1]。针对宫中卫士,世宗曾经要求:“应卫士有不闲女直语者,并勒习学,仍自后不得汉语。”^[1]在宫中,皇孙即章宗,“始习本朝语言小字,及汉字经书”^[1]。大定十一年(1171),世宗命歌者唱女真歌,趁机教育太子及诸王说:“汝辈自幼惟习汉人风俗,不知女直纯实之风。至于文字语言,或不通晓,是忘本也。”^[1]

女真进士科的创立,与女真字学的兴办是分不开的。大定九年(1169),选拔诸路女真字学生“尤俊秀者百人至京师,以编修官温迪罕缔达教之”^[1]。大定十三年(1173),以这批女真字学生为主,试以策论,取徒单猛以下27人为“策论进士”。需要注意的是,世宗创立女真进士科,不是为了推动女真人的汉化,其主要目的在于鼓励女真人学习本民族的语言和文字,弘扬女真传统文化。女真进士科的定制是以女真大字试策、以女真小字试诗,故元代史家评论:“夫以策论进士取其国人,而用女直文字以为程文,斯盖就其所长以收其用,又欲行其国字,使人通习而不废耳。”^[1]不仅如此,女真进士科的创立还有另一层深意,这可从世宗和左丞相完颜守道的对话中反映出来,当时世宗说:“契丹文字年远,观其所撰诗,义理深微,当时何不立契丹进士科举?今虽立女直字科,虑女直字创制日近,义理未如汉字深

奥,恐为后人议论。”^[1]守道回答:“汉文字恐初亦未必能如此,由历代圣贤渐加修举也。圣主天姿明哲,令译经教天下,行之久亦可同汉人文章矣。”^[1]由此看来,世宗创设女真进士科的初衷不只是要保存女真文化,而且要让它逐渐发展壮大、自成体系,使其能够与汉文化相抗衡。

将儒家经典翻译为女真字文本,这是世宗致力于女真文化建设的另一贡献。自大定四年(1164)世宗下诏翻译汉文典籍开始,先后译出《易》、《书》、《论》、《孟》、《春秋》、《孝经》、《老子》、《文中子》、《刘子》以及《史记》、《汉书》、《新唐书》、《贞观政要》等,这些译著被作为女真字学的教科书,颁行到全国各地。以女真字来翻译儒家经典,这种做法最能体现世宗的文化主张,他一方面积极倡导学习女真语言文字,另一方面又很赞赏儒家的伦理道德观念,即“欲女直人知仁义道德所在耳”^[1]。在世宗看来,女真人朴实无华的传统美德与儒家的价值观念非常契合,他曾这样对臣属说:“女直旧风最为纯直,虽不知书,然其祭天地,敬亲戚,尊耆老,接宾客,信朋友,礼意款曲,皆出自然,其善与古书所载无异。汝辈当习学之,旧风不可忘也。”^[1]从这个角度考虑,世宗很乐意接受儒家文化,他曾“以女直字《孝经》千部付点检司分赐护卫亲军”^[1],并对宰执说:“朕所以令译五经者,正欲女直人知仁义道德所在耳。”^[1]他的目的是要把儒家的伦理道德观念移植到女真文化中去,而不是让女真人抛弃本民族文化来接受汉文化。

(2)为了恢复女真民族的“尚武”传统精神,世宗以身作则,倡导女真传统的围猎骑射。骑马射箭,对于北方游牧民族来说,是进行军事训练的一项重要内容。世宗对这个问题也相当重视,他本人“善骑射,国人推为第一”^[2],在这方面可以说是族人的表率。据历史记载,早期女真人的“尚武”传统,是“以射猎打围便为战阵,骑射打毬阅习轻锐”^[8]。为了激励女真人习武,世宗常常在宫中或野外围猎击毬,臣僚以危险谏阻,世宗便说:“祖宗以武定天下,岂以承平遽忘之邪?皇统尝罢此事,当时之人皆以为非,朕所亲见,故示天下以习武耳。”^[1]大定年间,世宗曾先后10次到山后的金莲川驻夏捺钵,每次驻夏的时间长达4、5个月,时人谓“名为坐夏打围,实欲服劳讲武”^[1]。对于女真人的围猎骑射,世宗总是作为一件大事,时时挂在心上。有一次,世宗对宰执说:“西南、西北两路招讨司地隘,猛安人户无处围猎,不能闲习骑射。委各猛安谋克官依时教练,其弛

慢过期及不亲监视,并决罚之。”^[3]此外,为防止女真人荒废骑马射箭的技术,政府还采取过一些特殊的措施。大定九年(1169)三月,“以尚书省定网捕走兽法,或至徒,上曰:‘以禽兽之故而抵民以徒,是重禽兽而轻民命也,岂朕意哉?自今有犯,可杖而释之。’”^[2]。这里所说“网捕走兽法”做何解释呢?由大定二十九年(1189)十二月“谕有司:女直人及百姓不得用网捕野物,及不得放群鵬枉害物命。亦恐女直人废射也”^[1]就可知了。很显然,这一条在重申前一条的命令。

为了配合恢复骑马射箭的举措,在生活领域禁用汉姓,禁着汉装。强调女真人不得改称汉姓,改服汉服,犯者处罪。“禁女直人毋得译为汉姓。”^[1]“禁止女直人不得改为汉姓,学南人衣装,犯者抵罪。”^[1]大定十六年(1176),世宗诏谕宰相:“诸王小字未尝以女直语命之,今皆当更易,卿等择命以上。”^[1]作为一般情形,当时女真贵族大都以汉名为学名,但小名一般习惯于用女真语称,而当时宗室诸王连小名也喜欢采用汉字,所以世宗才要求改用女真语。

(3)重建与上京的关系。海陵王迁都燕京,割断了与女真宗室的联系。为了使女真民族更团结、更强大,世宗登基后的首要任务是重建与上京女真宗室的关系,他曾对宰执吐露过这种忧虑:“会宁乃国家兴王之地,自海陵迁都永安,女直人寝忘旧风。朕幼时尝见女直风俗,迄今不忘。今之燕饮音乐,皆习汉风,盖以备礼也,非朕心所好。东宫不知女直风俗,第以朕故,犹尚存之。恐异时一变此风,非长久之计。甚欲一至会宁,使子孙得见旧俗,庶几习效之。”^[1]在上京,上谓宗戚曰:“朕思故乡,积有日矣,今既至此,可极欢饮,君臣同之,赐诸王,妃、主宰执百官命妇各有差,宗戚乡人皆沾辞起舞,竟日乃罢。”^[1]上谓群臣曰:“上京风物朕自乐之,每奏还都,辄用感枪。祖宗旧邦,不忍舍去,万岁之后,当置朕于太祖之侧,卿等无忘朕言。”^[1]后在皇武殿,宴请宗室、宗妇,大加赏赐。曰:“朕寻常不饮酒,今日甚欲成醉,此乐亦不易得也!”^[1]宗室妇女及群臣故老依次起舞,进酒。世宗说:“吾来数月,未有一人歌本曲者,吾为汝等歌之。”^[1]命宗室弟叙坐殿下者皆坐殿上,听上自歌。其词道王业之艰难,及继述之不易,至“慨想祖宗,宛然如睹”^[1],慷慨悲激,不能成声,歌毕泣下。离开上京时,世宗辞别宗室说:“朕久思故乡,甚欲留一二岁,京师天下根本,不能久于此也。太平岁久,国无征徭,汝等皆奢纵,往往贫乏,朕甚怜之。当务俭约,无忘祖先艰难。”^[1]因泣数行

下,宗室戚属皆感泣而退。

三、历代对女真汉化与金亡关系的见解

金中叶,世宗为挽救女真民族传统文化而采取的种种措施,终究未能阻止女真人的汉化趋势,这场女真文化复兴运动不得不以失败而告终,其标志是章宗最终放弃了维系民族传统、遏止女真汉化的努力。第一,泰和六年(1206)宣布允许猛安谋克户与州县民户自由通婚。在此之前,金统治者的一贯政策是禁止猛安谋克户与州县汉人通婚,世宗对此尤其注意防范,“世宗不欲猛安谋克与民户杂处,欲使相聚居之,……其后遂以猛安谋克自为保聚,其田土与民田犬牙相入者,互易之”^[1]。但随着女真人汉化程度的加深,他们与汉人之间的通婚事实上已无法禁止。章宗明昌二年(1191),“尚书省言:‘齐民与屯田户往往不睦,若令递相婚姻,实国家长久安宁之计。’从之”^[1]。这是缓和女真人与汉人之间因土地争端造成的矛盾而采取的一个权宜之计。至泰和六年(1206)十一月,“诏屯田军户与所居民为婚姻者听”^[1],亦即正式宣布开禁。这条举措意味着金政府放弃了阻挡女真人汉化的努力。第二,泰和七年(1207)十二月,“诏策论进士免试弓箭、击毬”^[1]。这说明章宗放弃了维护女真民族传统的希望。章宗明昌年间,猛安谋克不世袭武职,竞相登第科考。“赤盏尉忻,字大用,上京人。当袭其父谋克,不愿就。大明昌五年策论进士第。”^[1]至金末年,猛安谋克的文弱游闲之风已不可挽救,“乌林答爽,字肃孺,女真世袭谋克也”^[9]、“作奇语,喜从名士游”^[9]、“抄写讽诵终夕,虽世族,家甚贫”^[9]。猛安谋克弃武习文的结果,涌现出如完颜斜烈兄弟、移刺延玉、温甫总领、夹谷德固、术虎士、乌林答肃孺等,其诗文虽可称道,但“于国弗便”。

金亡,元代君臣开始讨论前朝亡国的教训,据历史记载,忽必烈在潜邸曾问张德辉:“或云,辽以释废,金以儒亡,有诸?”张德辉答:“辽事臣未周知,金季乃亲睹,宰执中虽用一二儒臣,余皆武弁世爵,及论军国大事,又不使预闻,大抵以儒进者三十之一,国之存亡,自有其责者,儒者何咎焉!”^[10]从君臣这段对话可以看出,金元之际社会上流传“金以儒亡”一说,也许张德辉没有领会忽必烈的意思,答非所问,这里忽必烈提出“金以儒亡”一说,主要指金因过分的汉化而丧失民族传统文化,最终导致亡国,而并非说“金亡于儒生”之手。金亡于汉化说有其合理性,但儒学不应是金覆亡的根源。

清统治者在总结金亡的经验教训时,把责任推到了熙宗和海陵身上,指责他们“循汉人之俗”^[1]、“效汉人之陋习”^[1]、“尽失其淳朴素风”^[1]。1636年,皇太极召集诸亲王、郡王、贝勒及朝廷臣僚等读《金史》,对世宗维护女真民族传统的举措大加赞赏,并以此劝谕众人不忘满洲传统,他说:“朕发此言,实为子孙万世之计也,在朕身岂有更变之理。恐日后子孙忘旧制,废骑射,以效汉俗,故常切此虑耳。”^[11]以史为鉴,皇太极的担心确有道理。但到乾隆时期,这个问题才真正引起统治者的高度重视。乾隆二十四年(1759),他在为官修的《皇朝礼器图式》一书所做的序中就表明过这一态度:“至于衣冠乃一代昭度,……朕则依我朝之旧而不敢改焉。……且北魏、辽、金以及有元,凡改汉衣冠者,无不一再世而亡。”^[12]后来他又在《御批通鉴辑览》中屡屡阐述他的这种观点。乾隆三十七年(1772),高宗在审阅三通馆进呈的《嘉礼考》一书时,就服制问题再次对满人提出儆戒:“自北魏始有易服之说,至辽金元诸君,浮慕好名,一再世辄改衣冠,尽失其淳朴素风,传之未久,国势寢弱,及沦胥。盖变本忘先,而隐患中之。覆辙具在,甚可畏也。”^[13]高宗以前代北族王朝的覆亡为鉴,把保持满人衣冠旧制看作是维系民族传统的最重要一环,故一而再、再而三地强调这个问题。自乾隆以后的清朝统治者日益感受到汉化的威胁,因此发起了“骑射国语”的运动,极力倡导满洲人骑射的长技和本民族语言,强调保持民族传统的重要性。

但是,作为金亡见证者的刘祁却不这样认为,他把金的灭亡归结为“分别蕃汉”^[9]和不能“尽行中国法”^[9]以至于“不能长久”^[9]。按照刘祁的说法,金之所以亡国是因为汉化还不够彻底。而元初学者许衡对这种认识做了进一步的注解,认为:“考之前代,北方奄有中夏,必行汉法,可以长久。故后魏辽金历年最多,其他不能实用汉法,皆乱亡相继,史册具载,昭昭可见也。”^[14]同样,作为清代汉学者论及金亡原因时,认为金章宗“婢宠擅朝,而金源氏衰矣,非习汉人风俗之过也,……金源氏可谓负汉人之法度矣”^[15]。

四、结 语

金世宗深受汉文化和女真文化的影响,作为女真人的皇帝,女真本位的思想仍占有重要的地位,但要顾及到汉人的心理。海陵南征失败后,金、宋、西夏的鼎足之势,使他不得不励精图治,恢复女真民族蓬勃的“尚武”传统,在国防竞争中继续保持优先

的地位。面对日益令人担忧的汉化状况,世宗虽然强调女真的“尚武”传统与汉文化的伦理道德是一致的,但是他未能找到2种文化的契合点,最终为恢复女真传统文化而做的努力宣告失败。

虽然事与愿违,世宗为保存民族文化、维护民族传统所做的努力,是值得肯定的,也应该客观看待。第一,女真人的汉化彻底改变了其传统的生活方式,使他们养成懒惰奢靡、耽于逸乐的生活作风,从而使这个一度生气勃勃的民族最终走向衰落。第二,女真人的汉化彻底销蚀了其传统的“尚武”精神,使得这个昔日强大无比的马上民族在蒙古人的铁蹄下变得不堪一击。金以兵立国,女真人从“尚武”到“不武”的转变,给大金王朝的国运兴衰带来了决定性的影响。毕竟每一种民族文化,都有它自身生存的权利和存在的价值。文明和野蛮、先进和落后只是暂时的,都不能作为一种文化必然同化于另一种文化的全部理由和借口。对于金世宗所做的努力,如果站在汉民族的立场,不做客观公正的评价,是有失公允的。从金末到元,文人、学者、政治家对于金亡与汉化关系的剖析都反映了这一点,无论是忽必烈的“金以儒亡”,还是清统治者的看法,都是基于少数民族的立场。而以刘祁为代表的汉学者不但未把金亡归结为汉化结果,反而认为是“不尽行汉法”的

结果。千古兴亡,站在今人的立场来看,汉化与金亡有一定的关系,但也有其他的因素,且是多种因素导致的,这些都需要我们从历史的角度客观看待。

参考文献:

- [1] 脱脱. 金史[M]. 北京:中华书局,1975.
- [2] 陈亮. 中兴论[M]. 北京:中华书局,1974.
- [3] 徐梦莘. 三朝北盟会编[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 [4] 元好问. 中州集[M]. 太原:山西古籍出版社,2004.
- [5] 宇文懋昭. 大金国志[M]. 北京:中华书局,1986.
- [6] 张晶. 文化融合与排拒中的金代诗歌[J]. 殷都学刊,2002(3):59-61.
- [7] 三上次男. 金代中期における女真文化の作兴运动[J]. 史学杂志,1938(2).
- [8] 楼钥. 攻媿集[O]. 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 [9] 刘祁. 归潜志[M]. 北京:中华书局,1983.
- [10] 苏天爵. 元朝名臣事略[M]. 北京:中华书局,1985.
- [11] 图海. 清太宗实录[O]. 崇德元年十一月癸丑条.
- [12] 允禄. 皇朝礼器图式[O]. 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 [13] 董浩. 清高宗实录[O]. 乾隆三十七年十月癸未条.
- [14] 苏天爵. 元文类[O]. 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 [15] 陆陇其. 三鱼堂文集[O]. 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Commentary of the conflict between Jurchen culture and Chinese culture

SHA Yong

(Department of History and Culture, Gansu Normal University For Nationalities,
Hezuo 747000, Gansu, China)

Abstract: In order to make an exploration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Jurchen culture and Chinese culture, and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Jurchen-Chinesized and Jin dynasty' extinction, the paper conducts analysis for the background, causes and manifestations of the cultural conflicts between Jurchen culture and Chinese culture in the time of JIN Shi-zong with the combination of historical literatures with predecessors's ideas abou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Jurchen-Chinesized and Jin dynasty' extinction. The analysis shows that when Jurchen culture went to death, JIN Shi-zong energetically sought for conjunction point of two cultures on the ground of preserving self-consciousness of Jurchen culture. He set up Jurchen writings and initiated Jinshi scholars of Jurchen, translated Chinese Confucianism into Jurchen linguistic writing. However, all those measures taken could not stop the Jurchen-Chinesized trend, and cultural renaissance of Jurchen failed. But all the efforts made by JIN Shi-zong to preserve national culture and maintain national tradition should be given a great compliment.

Key words: JIN Shi-zong; Jurchen culture; Chinesization; commentary